这么一个允许勤力、精明、目光远大、坚韧不拔的人获取财富、名望乃至社会地位的地方。他攫住机会使自己于一九一一年成为百万富翁，旋于欧战结束时成为超百万富翁，有了大量财富，他才能够，也愿意为叻闽二地做出了社会与教育方面的巨大贡献。他在自传《南侨回忆录》中坦言，若非获致足够资财，自己一生的社会政治事业乃无基石。7

      一八一九年后之新加坡社会虽已为多元民族所共处，惟其自由港地位及英人之开放政策，却引来了中国沿海一带的大量移民，使马来人口在比例上急剧下降。自一八六零年开始，新加坡华族人口已凌居上风。一九二一年，在三十一万五千一百五十一名全部华族人口中，移民占七十五巴仙。十年后，全岛四十一万八千六百名华族人口中，移民比率降至六十四巴仙，至一九四七年，移民压倒侨生华人的形势才扭转过来。按该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在全部七十二万九千四百七十三名华族人口中，侨生者占据了六十巴仙。即使是在这个比较晚近时期出生的华人，大多数仍然是接受华文教育、口操华语者，他们在文化上、在思维方式上一般还是倾向华侨社会的。

      不过，总体上说，与华侨社群相比，侨生华人的思想与生活方式都是比较西化的，他们在更大的华人社群中，也是比较现代化的一群。侨生华人社群一路来亦能培养一批批能力卓著，德高望重的领袖，为殖民当局所认可。由于口操英语，大多数乃被聘为公务人员、当行政长官、书记或其他职位。他们也在私人机构，尤其是在银行、保险公司、船务公司及洋行中任职。众所周知，侨生华人之最大的愿望乃充当买办，即成为欧资银行、洋行与公众之中介人。在商场上，他们一样长袖善舞，二十世纪数闻人如林文庆、李俊源（一八六八至一九二四）、林义顺（一八七九至一九三六）及其他几位，乃当地一些银行、保险公司及企业的创办者。或者是为着吸取一些华侨资本以支持自己的新投资吧，他们与华侨社会首领与资本家频频合作，共同推动与华侨社会利益相关的社会、经济及政治活动。侨生华人社群也组织了不少社交团体如俱乐部、体育会等，其中最为人知的乃是海峡华人公会（SCBA),它创办于一九零零年，是侨生华人争取自身利益的一个压力团体。

      必须承认的是，陈嘉庚时代的华人社会是四分五裂的，主要是语言、教育背景、地域观念、职业类别及政治观点等差异，加上帮派间的对抗、帮派间领袖之私怨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从实质上看，新加坡华人社会可轻易地就方言类型归纳为七个大小不同的帮派，即闽帮，以福建漳、泉二大州移民为主。此外尚有潮帮、广帮、琼帮、客帮及侨生帮。侨生帮代表一批受英文教育、口操英语者。最后是三江帮，此帮代表闽、广二省北部少数移民等。

      无论在传统上或人口数量上说，闽帮在新加坡历史上始终是一个主要的单一的帮群。一八八一年，他们在新加坡华族人口比例上占二十八巴仙，至一九二一年、一九三一年及一九四七年，一直保持在四十三巴仙之水平。福建人乃十九世纪商业泰斗，迄二十世纪，在这一些更为新兴的经济领域里，如银行业、保险业、金融业、船务业、树胶加工与制造业及出入口贸易中，更是独占鳌头。在新加坡华人社会中，福建帮享有的人口优势与雄厚财力，使他们不论在竞争素质及同心协力上皆较他帮稍胜一筹

      潮帮与广帮在规模上可说是旗鼓相当，二帮在一九零一年总华族人口比例上占三十五巴仙，一九四七年为四十三巴仙。潮州人士于十九世纪时在商场上表现不俗，控制了胡椒、甘蜜种植与买卖生意。他们中多数曾在柔佛一带置业，然而经济管理与营业扩充上表现的过于拘谨，他们不能及时抓住树胶业的好势头。广东人士则曾以手工艺之精湛著称于十九世纪，惟大部分却于二十世纪时转入零售行业。琼州人多操户内工作，或为船货供应商及开咖啡餐室等。客家人士在十九世纪时，多在新加坡务农，迄二十世纪则散见于各行各业中。三江人士南来较晚，惟至二十年代、三十年代时期已逐渐汇集力量，尽管如此，他们在今日仍属小社群。

      华侨社会不但生机旺盛，而且还是力图上进的，尤其是在社会与教育领域的表现。华社常在创办学校、慈善团体、同乡会、社交俱乐部、宗亲团体及庙宇等方面，出钱出力，不遗余力。英官方自一八九零年始即逐渐封闭与取缔华人私会党，使其影响逐渐式微。一九零六年创立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是二十世纪华社的最高组织。它是一个帮际团体，董事会是由各帮推举代表组成的。福建帮因人口优势而获得更多董事职位之分配。至于会员，乃由各帮自行征召，故推选董事也沿此方式，所以说，新加坡的华侨社会基本上乃是一个以帮为本位与结构的社区组织。基此，就人数参与之众，人力动用之广，参与社团之多而言，华侨社会在组织上远较侨生华人社区完善得多。

      华侨社会人数众多、资力鼎厚，组织完善与坚实。是故，一当面临共同危机与紧张情势时，这种势众财雄及娴熟的运作技巧即可迅速投向社会或政治行动中。所以说，新加坡华侨社会中的帮派组织，不能说是无助于社会及政治动员工作的。陈嘉庚虽然乃以厌恶帮派观念及帮派势力著称，却又实事求是地充分调动与利用其本帮之势力以提高及巩固本人之领导地位及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新加坡华人社会中仍未出现明显的阶级分野现象。工人阶级在新加坡人数众多，惟多为文盲，政治敏悟力低，工人阶级意识觉醒仍有待形成。况且，英国之封禁马共及施行阻止共党势力操纵工会之措施，对工人阶级团体之出现，对劳资尖锐对立局面的出现，皆起着巨大阻遏作用。然而，在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后的民族危机中，共产党人却充分动员新加坡华族工人以达致其社会与政治目标，如要求改善工人待遇及号召罢工等。迄至四十及五十年代，当各政党为扩大各自之政治势力时，新加坡社会，尤其是华人社会之阶级色彩才显得浓厚。

      在组织上，二十世纪海峡殖民地的华侨社会是比较复杂的，它既有较新式的，也保有较古老的组织。古老的仍一脉相承，沿袭着血缘关系（如家庭、族亲或姓氏等）、宗教、秘密团体、同乡及帮派（如会馆及依据村、县、洲、省而组成之乡团）等脉络组成。而比较新式的组织却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副产品，它包括商会、社交团体、专业团体、行业工会、文教体育团体、政党及职工会等等。虽然说它们中大多数乃属自发性的、互助性的团体，其中一些（如政党、职工会、私会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等），仍不失为压力团体。

      这一些复杂与互相交错的社会网络却为各帮及社会领袖提供了组织上及势力上的地盘。这些领袖即通过它们施加影响贯彻彼等在帮派、社会及政治方面之倾向。是故，平心而论，这些新式与古老的团体乃为侨领袖与政治领袖之神经中枢。

      年方十七之陈嘉庚于一八九零年晚秋南来新加坡，在新加坡他花了五十余年的岁月，寻觅、奋斗并最终获致了社会及政治领导大权。直至一九五零年五月回返新中国为止。他的来与去，象征着一个华侨时代的启始与一个重大时期的终结。在这个重大的时期中，华侨在新加坡岛上的华人社会里，一直努力不歇的争取及接受挑战并最终成功的统驭了社会及政治的领导。也不仅此，通过创办厦门大学、领导山东筹赈会、星华筹赈会、南侨筹赈总会，与公开支持四十年代之印尼与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最终大胆支持毛泽东的政权，陈嘉庚已光芒焕发地成为了一个民族（中国的），乃至整个东南亚及亚洲的风云人物。

**第二章 陈氏家族**

饮水思源 永不忘本

——陈嘉庚论故土

      同安是泉州府五县之一，漳州府位于西南，福州府位于东北。同安县面积与新加坡相近（二百二十五平方里），一九一一年时人口二十五万，亦与当时新加坡之人口总数同。同安地势内陆丘陵起伏，向沿海地带伸延时渐趋平缓。北部与盛产茶叶之山区安溪县接壤，东侧为南安县，西侧为漳州府所辖漳台、海澄二地。南部濒南中国海，海水拍岸，日夜可闻。厦门、金门二岛则守护着其门户。天高气爽时若登临同安境内天马山，厦门岛在风平浪静中历历可见矣。近一个世纪以来，厦门已成为南方门户之一，数以百万计的福建人士即自此涌往海外各地。

      同安县内共有十三个大小村庄，集美村位于其最南端，凸伸向海，成一个半岛，故最靠近厦门岛。自古以来，集美即为海外归客视为风景绝佳之地，他们的双脚甫离甲板，即跃登小舟朝同安的各个村子进发。集美村乃陈氏族人的故乡，陈嘉庚诞生之地，舟程不过半小时光景。一九五五年，筑堤工程竣事后，厦门与同安之间即由一海堤相衔接，省却了海外归客或访客不少劳顿之苦。甫抵集美之来客将会不期然的感到，一片闪烁着亮光的海水渐渐伸向远方，并消失在隐隐群山之后。而浔江又是那么慢悠悠的流着，在来客们神驰中流向南方，最终消失在天马山脉后。同安之名乃取其“共同安乐”之意，至若来源则已无从查考，亦不重要，因为对同安人说来，只要他们家乡中的山山水水相安无事，即与地名契合无误了。

      漳、泉二州不论在历史上或传统上皆为华南富庶之地，素以东南亚、中东及欧洲之商贸往来著称。早在宋、明时期，此处即为华南二大造船中心之一，而商贸自来即为其主要经济命脉。在农业上，它是闽省二季稻之心脏地区。1由于拥有许多小岛屿及港口分布在其曲曲弯弯海岸等地利关系，捕鱼、航运及海盗等自古即为同安人之传统行业。

      同安地区山脉陡峻，海景多变，造成了同安人民性格中多变与坚毅的特征。当山脉积淀着节俭、简朴与诚挚等特质，航海传统则助长了同安人独立、冒险、奋发、顽固、正义与矛盾等品性的形成。为了生计，他们被迫要竭力训驭变幻莫测的气候，遂使他们变成了一种顽强的民族。与外商往来之传统亦练就了一身经商本事，掌握了精打细算及铁面无情的买卖手腕。

      排满与抵御外侮是航海之外同安人士所具有的另一种历史传统。闽南人士的这种爱国主义情绪萌芽于明朝末年。当时，民间英雄郑成功（一六二四至一六六二）建立了一支海陆部队借以抗拒满人统治达十二年之久。郑成功将支持他的福建人全部集中于集美、厦门及金门等处。郑成功坐镇南安指挥闽南人民不断骚扰、攻打及击退从华南与沿海一带进击的满清海军。一六六一年，他以九百艘船队人数，成功的自荷兰人手中夺占了台湾。他的儿子在他死后继承他的事业达二十年之久直至厦门于一六八一年及台湾于一六八三年被清廷占领时为止。通过勇敢、牺牲、坚毅与骁战的精神，辅以浓烈的排满情绪，使闽南人能够进行并坚持如此长久斗争。排满的势力虽然消失了，排满的民族主义精神不死，一旦时势召唤，这种潜伏着的精神即能循序显现，一八五三年间崛起的排满组织“小刀会”即为一明显例子。2若说闽南移民亦将这种排满精神带到东南亚来，其可能性是存在的。旷日持久的反抗在同安人中滋生着一种坚强、焦灼、牺牲与刻苦耐劳的不屈精神，这种排满情绪日后渐迭升华为同安精神，为全体同安人所分享与珍存。

      除了排满情绪外，同安精神中抵御外侮的成分乃孕育于林则徐所率反英鸦片战争时期（一八三九至四二）。林则徐虽为闽北人，他坚决禁止鸦片烟之抽吸、贩卖与进口与坚决维护中国权益的立场却深受全体福建人民的赞赏。尽管如此，同安精神中的排外情绪，在海外移民身上却比较隐晦。

      新加坡的同安人常因自己具有同安精神而显得沾沾自喜。他们认为同安精神中具备着坚忍不拔、勇往直前，骁勇善战与慈善为怀等特质与倾向。3坚毅不拔、勇往直前、骁勇善战意味着一种独立、献身、节制、灵活、无情与大无畏的特性，这一切乃是一个坚强、坚定与魄力十足之领袖人物所不可或缺的气质。而另一方面，慈善为怀与慷慨豁达又意味着一种公众意识、一种为达致共同目标的忘我精神、一种有所为的行动举止及高风亮节，嘉德懿行。

      同安精神，概言之，乃是坚强领袖气质与强力领导作风的综合体。不过，同安精神也有一些不足之处，正如新加坡一名同安领袖陈延谦（一八八一至一九四二）所指出的。同安人之个性极强，由长处方面看是具有义气，果断独立前进之精神，由短处而言则不能谦恭对人，稍遇不满意事，动辄使气任性。4陈嘉庚乃是当代最具影响力、最负众望的同安领袖，他具备着同安领导人中的各种领导特质与作风，包括同安精神中的不足之处。事实上，他简直是同安精神之体现者。除陈嘉庚外，同安社群中还不断涌现出一批批领袖人物，如陈祯祥（一八七四至一九二二）及其子陈振传（生于一九零八年）、陈延谦、叶玉堆（一八九七至一九八四）、林金殿（一八七九至一九四四），后者后来投入反陈嘉庚势力中。陈六使（一八九七至一九七二）、新加坡南洋大学倡办人、孙炳炎（生于一九一一年）、陈共存（生于一九一八年），陈嘉庚之侄儿等皆具有同安精神中之领袖特质与禀赋。

      对同安做了一般性观察后，现在有必要将集美村社与陈氏族人作进一步之阐述，从字义上看，集美乃“集中美丽”之谓，自古以来，它即是一个山明水秀之乡、天马山倚背、浔江蜿蜒流动、南中国海轻拍其岸，轻抚其滩。传说这一个三角洲之泥沙在数世纪前是由其三条河流（浔江、浏江、与鹭江）由内地夹带来的。当陈氏族人于这一片布满海蚝的土地上定居时，仅留下浔江继续流淌。农作、捕鱼及蚝是陈氏族人的三项劳作。人口逐渐膨胀后，陈氏族人即分成七房，散居于集美九处。一八七四年在集美总共有一百户人家，几全为陈氏族人。在一九一二年，据报村中人已进二千五百人之众。虽说数世纪以来人口皆不断增长，惟值得注意的是，偶尔出现的瘟疫（如一八八八年之瘟疫）及移民海外等情况皆使族中人口保持在一定水平上。十九世纪时集美居民多为老少妇孺。由于沃地缺乏、就业机会困难，壮实之年轻人多被迫移民海外。厦门于一八四零年代辟为通商口岸，也助长了陈氏族人的纷纷向外移民。

      十九世纪时期的集美村不能被视为一个民生凋敝的村庄，当时村中是有一些村民组织及福利团体的，也有一间传统书塾叫南轩私塾，专事教导村童四书五经之类的书，其经费来自村中福利组织，也来自陈氏移民的海外汇款。一些家境较佳的陈氏族人可以将子女送往厦门或福州深造。家境贫寒之子女则留下来干一些养蚝，烧蚝壳以涂饰房舍等粗活，或打柴烧炊或种植马铃薯以为食用。5这是一块美丽的土地呀，然而十九世纪集美所出现日渐恶化的社会、经济条件却需要向海外移民来作为缓解。

      “渊远流长”这一句中国成语可以贴切的沿用在集美陈氏族人身上。在此得先感谢陈厥祥先生，6是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份远溯至宋朝的陈氏族谱。陈嘉庚远祖为避战乱，自华北河南省固始县举家南徙，经江西后安居同安，当时之中国北方乃在女真族统治天下（一一二二至一二三四）。女真族为满洲人祖先，在中国北方立国号为金。后蒙古人灭金，立国号为元（一二七八至一三六八）。

      同安陈氏开基祖名陈肇基，是故名列陈氏族谱首位。陈肇基与妻卜居同安后，旋即成为一富裕地主，独子陈讳基与四个孙子最后搬往集美定居下来。自此，陈氏族人即在这一块浔江流经的土地上务农、捕鱼、繁衍子孙。陈氏族人历来皆少在宦场中崭露头角。自族谱中查出，惟一的例外，乃一名为陈文瑞者（一五七三年生），曾以进士（相等于如今之博士）封官，任江苏省苏州吴县知事。7据说他为官清廉、爱民且忠于明朝皇帝。这并非意味着陈氏族人无意于仕途，或做学问。恰恰相反，却有证据显示他们中有不少熟读圣贤书，且未经科试即被举荐为官，如第九代之陈国节与第十四代之陈世友（一六九三至一七七六）即是随手拈来之两个例子。8

      陈族第十五代之陈盛衡（一七三二至一七八四）一共生下七名男孩，论生育力远胜其前辈。他为人忠厚、勤奋、耐劳，且待人接物彬彬有礼，在集美置有数房产与耕地。9他的长子，第十六代之陈时钦（一七五四至一八三七），即陈嘉庚之曾祖。据说他是一名典型的谦谦君子，孝敬双亲，谦待朋友。他继承祖业，以渔耕为生，死时八十四岁，可谓高山仰止。他遗下三名子嗣，每一个都曾传宗接代。次子陈簪聚（一七九五至一八五六），是陈族第十七代，乃陈嘉庚祖父。他亦被视为一名忠厚、严厉、勤劳、人人敬之的族长、爱护子女与妻子，他亦以渔耕为生。虽然陈簪聚无心从商或出洋，他的三名儿子却有另一番打算。他们远涉重洋至新加坡后即从事米业，颇有成就，故生活优逸。惟从族谱中观察，长子陈缨忠看起来表现平平，因族谱对他着墨不多，仅提及他育有三名儿子。至于次子陈缨斟（一八三八至七六），据说不论在叻在乡皆表现不俗，虽说三十六岁即去世，可谓英年早逝，却曾因家财殷实而获官家颁赐六品修职郎官御。10陈簪聚幼子陈杞柏（一八四二至一九零九），即陈嘉庚生父，有关他的手头资料却比较翔实与可靠。有关陈氏家族第一代至第十八代之道德操守，族谱中的描绘始终是一贯的：勤奋、节俭、守法、且实践儒学亲亲爱子的训论。直到陈杞柏这一辈为止，他们皆靠务农及捕鱼为生，鲜少从事商业经营的传统。

      陈杞柏生于集美，其确切生年未详。其二哥陈缨斟生于一八三八年，若据此而做出比较合乎逻辑的推算，陈杞柏应该是生于鸦片战争（一八三九至四二）前后。他年轻时即随二位兄长至新加坡，在米店当学工，时或在一八六零年代。至陈嘉庚出世（一八七四年），他已在吊桥头自设米店，取名顺安号。顺安自交趾支那、暹罗及缅甸输入大米内销新加坡或转销马来半岛。至于为何从事米业，其理不难明了，盖大米自来即为亚洲人主要食粮，随着中国移民日增，新加坡及马来联邦地区对大米之需求亦日增矣，故谁人能操纵其来源，则牟利致富乃指日可期之事。新加坡华族商人因米业致富者计有陈金钟（一八二九至九二）及邱正忠（一八二零至九六），二人亦是星岛闽帮领袖。而且，陈杞柏在帮忙兄长处理店务时，已在米业买卖方面建立了良好的生意网络。

      陈杞柏在一八七零年代时，自顺安米店获致巨利，然后再向房产业方面发展。此外，他也开了一间硕莪厂，生产硕莪供外销。至于黄梨园，约在一二百英亩之数，到了一八九零年代，他开始在新加坡设立黄梨制造场，所产全供海外需求。迨一九零零年陈杞柏已臻经济成就高峰，全部资产估计在逾四十万元之数。他亦是最大的黄梨出口商与包装商，据说他已经操持了七十巴仙的黄梨罐头出口生意，其“苏丹”牌产品乃炙手可热的商品。11

      据陈育崧所述，12陈杞柏一生中所经营之商号约在十八间之谱，包括其族人合创者在内，其中五间有“美”字为号（取集美之意），另外十三间取“安”字为号（取同安之意）。此说虽不易印证，惟为陈杞柏自创或与人合创之商号列一份清单却不难，它包括金胜美（经纪）、顺安（米）、德安（米）、源安（米）、福安（米）、振安（铁）、竹安与协安。尽管如此，有一些与他有关的商号却不挂“安”与“美”字号者亦不难发现，如庆成（洋灰）、日升（黄梨）及新开茂等，这是陈杞柏在一八九零年代的成功史，即便如此，陈嘉庚对顺安经营之妥善，乃陈杞柏此阶段成功之一项不容忽视因素矣。我们不妨将此截史实留待下章，俾与顺安一九零四年倒闭之始末一并剖析。

      陈杞柏的社会地位颇高，曾担任不少社会职务。自一八七八年保赤宫陈氏宗祠在叻成立后，陈氏即成为陈族的一名显要领袖，保赤宫建筑堂皇，迄今仍完好保留在麦肯西路（MAGAZINE ROAD),庙院中竖立有四块牌匾，籍资纪念该庙宇兴建与筹款活动事宜，其中二匾说明了在一八七八年度陈杞柏乃十八名总理之一，一八九八年则为八名总理之一，至一九零三年，当保赤宫在淡申路庙属义山筑路造亭时，他又受委为三名专事负责此项工程的总理之一。13

      陈杞柏虔信佛教，一九零三年他也参与兴建叻梧槽莲山双林寺，乃九名参与其事的理事之一。14一九零四年，在福州兴建的一间佛寺，他是星洲三名发起筹款活动的理事之一，他本人也认捐了三百元。15

      同当时的许多华人一样，陈杞柏也是古道热肠者，当同济医院于一八九一年在新桥路兴建时，他属下所有商号纷纷解囊捐助：顺安一百二十元、德安八十元、协安六十元、振安五十元、福安四十元、闽帮在此次筹款活动中计得二万元以上，远驾他帮。16

      尽管如此，陈杞柏在当时并不能视为闽帮中最重要的领导者，也不被视为新加坡华人社会中一位广受承认的社会领袖，惟他是闽帮领袖之一，突出与颇具影响力乃是真的。一八九六年，组织一间华人商会以为一个团体曾是一班新加坡华族商人与领袖的设想，尽管此项计划流产了，他们确曾为此聚首了两次。陈杞柏在四十人筹备会中乃十三名闽帮代表之一。17他们曾经一番努力，并且也草拟了一份章程，惜该商会终未见成立，其因迄今未详。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是在十年后，即一九零六年才成立的，作为当时一位受承认的闽帮代表，陈杞柏对于此商会之成立尝献谋划策，又未始不是一名始作俑者呢。

      当陈杞柏于一九零四年申请归化为英籍民时，当时的行政议会即加以批准，18这是英殖民当局对他作为一名成功商人、一名闽帮领袖的一种敬仰与重视。

      陈氏族谱形容他为一位正直、和蔼的人，他的儿子陈嘉庚也说其父是一位居家型的人、一位生活简朴者。他当时住在顺安米店三楼，二楼充为客厅，用以招待客人或阅读书报。他在这里度过了二十年时光，抽吸鸦片是他唯一的侈奢。19他晚年归隐故园。据一位族人陈赐曲所述，他当时年幼，犹忆陈老先生是那么平易近人、热情，戴一副眼镜，特别喜爱村中小童。当他一九零九年病故乡里时，福建省政府也派了无数官员前来致祭吊唁，颇引起了一番轰动。

      陈杞柏结婚三次，育有十子。20第一次在新加坡所娶之妻去世得早。第二位妻室乃一新加坡侨生，姓苏，为他生了陈天乞与陈天福二子，他的另一头婚事是在中国行，新娘乃来自集美一靠海村子孙厝社之孙氏女，为他生下了陈嘉庚与陈敬贤（一八八九至一九三六）两兄弟。此外，他还收养了其他六个孩子。依族谱所列，孟庚居首，嘉庚挨次，下来则是长庚，长龄，长修，长城，敬贤（第七），天乞（第八），天福（第九，又名亚峇及光亮）及天禄。除了陈嘉庚与陈敬贤外，族谱中极少提及其他兄弟的情况，至于陈杞柏是否生有女儿，也是无从查悉。

      陈嘉庚的母亲在集美将两个孩子一手带大，其父一来远在异帮，一来又忙于照顾店务，未能常常回乡，他的母亲一生中未离开集美一步，后来在一八九七年的一场瘟疫中逝世。

      陈杞柏晚年健康日差及最终病逝后，陈家事业即开始由陈嘉庚与陈敬贤起来担当了。既然陈嘉庚已被推向舞台中心，我们应该将他们与双亲的关系、他们的品格特性、他们的家庭概况与自身的关系等做一番审视。

      陈嘉庚与陈敬贤兄弟俩的童年生活，无论怎么说，都不应算是完满愉快的。父亲不在身边，对父亲鲜有所知，乃促使他们必须做独立思考，同时做自己要做的事。两人在精神上，在感情上不免倾向于母亲，毕竟是母亲给予他们所需要的慈爱与照顾，他们在领受之余，也深铭不忘。即为此，他仍与一八九三年奉母命赶回家乡迎娶了张氏女，一八九七年母亲病逝时，陈嘉庚本欲回来奔丧，却因业务缠身而作罢，母亲葬礼终于等到一八九九他回乡时才举行。母亲之死对弟弟敬贤宛如一场噩梦，年幼的他怎能忍受一位日夕爱护着自己的亲人遽然离去呢？有说他曾守候在灵柩旁达六个月之久，始终不愿离开慈母身旁。21至于欠缺父爱对于他们所造成的心理影响多深多大，迄今仍令人揣测，也许有人会不期然的下这么一个结论：此种影响是远超乎陈嘉庚本身所愿意承认的，在陈嘉庚一生中，他是以严厉、近乎无情的态度对待儿女，完全不是儒家的那一套。在他看来，给予子女们物质上的照顾就是了，至于感情流露乃多余的。总之，他花极少时间与子女们在一块，每年春节才让他们有个父子团聚的好日子。他在生时绝无意遗留任何产业予子孙后代，理由是：“贤而多财则损志，愚而多财则益过”。22他死时也没有留下分文给后代，在遗嘱中，他指示将遗留在中国的三百万元作如下处置：二百万元充集美学校建设费、五十万元拨为北京华侨博物院之兴建费，另五十万则留为集美福利基金。23自一九七年开始，陈嘉庚因太关心国事，故极少在家居宿。他住在新加坡武吉巴梳路怡和轩俱乐部内，居室简陋，仅置一张卧床、数张椅凳、一台书桌和一叠书本。

      陈嘉庚虽然极少流露出对子女的爱意，若据此即表示这是因为他在与父亲的关系中极少受惠之故，这说法亦不近情理。他能够在家乡接受数年基础教育，因而能读能写古文，乃拜其父之赐，父亲让他在自己的生意中接受磨练，否则他即不能在短短的时间里宏图大展。父亲的生意在一九零四年的失败却也为他提供了一个重新整顿的机会，因此一旦时机成熟，它即可以自立门户。最后一点是，他父亲数十年来辛苦经营的生意网络，在商界所享有的崇高信誉、地位，也使他获益不浅，也使他被圈子中人视为信誉卓著者。这是极端重要的事，这让他有充裕的时间去渡过经济难关、去扭转逆势。如果缺少一八九零至一九零四年期间襄助父业时所取得的生意网络，买卖诀窍及财务管理等有利因素，陈嘉庚竟能在短短七年间（一九零五至一一）即能赚取高达百万元之财富乃是让人难以置信的事。

      陈嘉庚幼年就读集美南轩私塾，接受一些儒学教育熏陶。和其他同学一样，他须要死啃硬背三字经、百家姓及千字文等课文而不求甚解。背得滚瓜烂熟后，就学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与孟子等。由于塾师从不加解释，陈嘉庚后来坦言他当时之儒学知识乃有限的。24他犹记得一八八七年自己不能回答父亲所提问的儒学问题时的窘境，惟十四岁的他，25从此即矢志发奋向学。毋庸置疑的是，几年的传统教育，尽管是一知半解，却让他受益匪浅，它为他扎下牢固的中文基础，培养他日后不断进修中国语文、文化的习性，儒学思想中的忠、孝、仁、义、克己、和谐、自励等教诲逐渐灌入他的脑海。陈嘉庚在他一生中是不是个忠实的儒家信徒呢？至少我们知道，在一九二零年代他仍保留为石叻孔教会会员。26从致给孩子们的大约二十项家庭规训中窥测，他明显的肯定了孔子的一些基本训导，27其中包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及“一个美好的家庭，是建立在仁、爱、孝、义、勤与俭等传统美德的基础上”等。

      除了学习孔孟著作外，陈嘉庚的童年即在捡拾极富营养性的海蚝，看顾幼小弟弟，在沙滩上嬉戏及呼吸南中国海清新海风中度过。他或曾在居于集美的最后一个夏季里下水游泳及作日光浴。一八九零年秋，十七岁的他，即被父亲召来新加坡帮忙打理顺安店务。抵步时，父亲发现他已然一个壮硕与热情洋溢的青年，陈嘉庚感激集美的山川河海，清新空气及取之不尽的海蚝给了他一副结实身躯。除了胃病、关节炎等晚年常见微恙外，陈嘉庚一生很少染患重病。在这一方面，他可比成年时即常受病魔缠身的弟弟强得多了。

      陈嘉庚一生皆向人们展现着不同的面貌。他个子不高，一九三零年《海峡时报》记者形容他为“矮小，瘦弱”者。28他先是蓄着辫子，前额半削。这是满清政府强迫人们蓄留的，借以象征对中原的征服。一九二二年后他则蓄胡子，使自己看起来老成、严肃。在陌生人眼中陈嘉庚显得冷漠严峻，其实他内心却是滚热的。他自一九三零年始即用拐杖，后将之馈赠给潘国渠（时为一九五零年）。为此，身为书法家兼诗人的潘国渠还特地赋了一首诗，诗中列举手杖之用途，其中之一是痛击不可救药的“狗”此乃隐示国民党中国之贪官污吏。29

      自来新加坡后，陈嘉庚即保持着一定的生活规律。在一九二零年代，除了星期天外，他每日清晨五时起身；起身前，他先在床上舒身，后即出门步行半小时，做深呼吸以吸收清新空气。之后洗身，然后以热浴巾擦身数次。六时用早膳，半熟鸡蛋三粒，牛奶一瓶，不用咖啡与烘面包，因为挚友林文庆告诫他咖啡具有副作用。七时由司机载他往塗桥头熟品厂，一日的工作遂开始了。

      在塗桥头工业大厦，他卸下领带、大衣，即步行到工厂巡视，直至中午。他会在巡视过程中停下来与职工们交谈并检视产品。

      当员工们用午膳时，他则在办公室内召集例常会议，出席者为七名分掌各不同部门的主任人员。会议一般上持续三十分至四十五分钟。主要乃听取各项生产之报告，主席即席解决主任所提之问题。因主席触觉敏锐，当机立断，会议极少超过四十五分钟。

      会后，司机即将他载往怡和轩、经禧路或麦雅路住宅用午餐。餐后即前往利峇峇里路总行政部处理各项业务，如树胶、黄梨、财务、销售、米业等等。在总行政部约有百名职员，其中包括两名年龄最大的儿子及女婿李光前。午后五时下班，他即回到怡和轩洗身、休息。他很少回家用晚餐，在外头用餐更是绝无仅有，晚餐后即步往阳台做柔软操。之后，即返身寝室休息。寝室乃位于俱乐部三楼（即顶楼），布置简陋，无室内浴室或洗手间。夜间，他即与会员们交谈，处理着各种社会或教育事务，如集美，厦大及当地华社的事务。午夜时分，他即被载往其中一处住家就寝，次晨五时起身。即便是一九三四年企业收盘后的年头，他还是一仍旧贯地作健身操及淋浴，以确保健康与警觉。

      陈嘉庚对食物极少讲究，他的午餐晚餐主要为一碗饭，一碗番薯粥，一些菜肉等。虽然怡和轩左近著名菜馆林立，如南天酒楼，备有外地名肴，他始终不曾前往尝试。陈嘉庚一生节俭，出门时身上极少带有超过五元之钞票。直到一九三四年企业收盘时为止，他从不曾踏入戏院一次，这是有关他近乎斯巴达式严峻的生活的另一个例子。根据陈育崧所述，那唯一的一次例外却是事出有因。原来，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工业部长陈公博莅新，数名怡和轩会员设宴招待，陈嘉庚为避迵乃跑到戏院去。陈嘉庚亦不曾为自己庆祝生辰，也严禁子女在该日去探访他，自己身体不适，亦不许他们前来探问。

      在一九八二年的一次访谈中，陈氏的第五公子陈国庆（生于一九一二年）向笔者坦告了这一点，并指出他父亲是一位忙碌、勤奋及献身公益的人，故无暇顾及孩子或家人，他的子女们即由各个母亲养育成人。

      陈嘉庚亦滴酒不沾。他年青时尝试过抽吸鸦片与雪茄。一九二零年年代即戒之。他不参与赌博、麻将、赌马一类更不知何物。他的一位挚友，即直至逝世为止皆历任怡和轩总理的林推迁（一八六八至一九二三），对这么一位会员赞不绝口。他说陈嘉庚是位正人君子，从没听到陈嘉庚在会所内提及“嫖妓”及“赌博”等字眼，他所讨论的不外是生意或社会事务。30陈嘉庚一生中也不曾涉及有关女人或赌债之类的丑闻。事实上，他对卖淫业一向深恶痛绝。31

      在社交方面，陈嘉庚是个守旧者，态度拘泥，令人有敬而远之的感觉。他于一九二零年代坚决反对抽吸鸦片，比之为奴役，他也反对西方交际舞，比之于世风败下之象。一九二一年厦门市政府发行彩票之举大大惹恼了他，他在报上提出强烈抗议，终导致发行彩票之举胎死腹中。一九一一年之后，他亦基于政治与美学的理由谴责满清服装，并攻击继续穿着长袍马褂之中国人。

      他也不能容忍虚伪、奢靡浪费（铺张婚丧、喜庆等）作风与好大喜功、贪污舞弊等行为。对于华人社会中充斥着的宗派、自私、无能、不负责任及闲混者，他感到非常痛心。对于巧言令色，夸夸其谈之辈，也从不卖账。

      在政治上，他揶揄利己主义者、戏弄奸诈者、蔑视与斥责通敌叛国者。一九三八年，他即直指后来在南京设立傀儡政权的汪精卫为“汉奸”，义正辞严，丝毫不顾及会引致争议的结果。一九四七年及一九四八年即中国内战后不久，他也不留情面的将蒋介石比诸石敬瑭与吴三桂。石敬瑭背叛晚唐（公元九三六），投靠内蒙一带之契丹；吴三桂则于一六四四年引清兵入关，使中原沦满，山河变色。

      据陈厥祥所述，自曾祖父至他一代止，他们的家族始终信奉佛教。32他祖父陈杞柏，他叔父陈敬贤及其母皆为虔诚佛教徒。至于陈嘉庚，究竟是什么程度上的一个佛教徒，乃令人颇费猜臆的事，既没有证据显示他常到庙宇进香祷拜，也不见他有若乃父般捐赠巨款修建寺院。他对慈善义举，不仅深信而且还身体力行。他也相信有因果那么回事。33对于“命运”也是一样，他即将父亲一九零四与自己一九三四年生意失败归诸于命运安排。34

      陈嘉庚善思考，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事理，并能将所思所想诉诸于文字或谈话，长篇大论或短小精悍兼具。然而，他更是一名战士，重实践，他敢想，敢于敞露自己的思想，敢于批评、敢怒，而且当需要的时候，又敢毅然付诸行动。尤有进者，他勇于坚持所信，并将自己认为正确的行动贯彻到底，不计成败，也绝不半途退缩。然而，一当理智告诉他应该妥协的时候，他亦会选择妥协以作为最佳解决办法。这就是此位不凡人物身上所闪烁着的种种特质与品格，历史将证明他将是新加坡与中国现代史上一名超凡脱俗的巨人。

      作为一位成就远超同代东南亚其他华人的人物，陈嘉庚亦被描绘为一位孤独的战士，不仰赖智囊相助。35或许，他终其一生皆像是一位孤独者，事实上，在不同历史时期，他皆有一群支持者、激赏者。一九一零年代，他的密友是林推迁、林文庆、陈祯祥与林义顺；一九二零年及一九三零年代，是孙崇瑜（生于一八九七年）、叶玉堆、周献瑞（一八八四至一九六四）、侯西反（一八八三至一九四四）及李亮琪。在一九四零年代，一批年轻的社会领袖与社会活动家如张楚琨、胡愈之、黄奕欢（生于一九零八）、刘牡丹（一九零二至八三）及孙炳炎等更在周围。他对自己的思想与行动先做一番思考后才征询他人意见，俾取得他们的支持。这一项思想准备工作即在怡和轩进行。

      陈嘉庚并不完全是一位孤独者，他善于交友，并善于为华人社会拣选适当人才，而且珍惜友谊，忠于朋友。与他有过接触者皆盛赞他为人客气，待人接物充满诚意。他与黄奕欢一生过从甚密，至于结谊则是始于一九三三年在同济医院举行的一次募捐会上。此次募捐活动乃为华北水灾灾黎遇难而举行的。会议主席陈嘉庚发表了令人感动的谈话，呼吁社会起来响应是项义举。当时与会人士并没有起来发表谈话，黄奕欢即立刻站起来发言表示支持主席，并号召响应组织救济会的吁请。陈嘉庚及侯西反二人并不认识他，对于他的口才却深具印象。会后陈嘉庚趋前向他做自我介绍并询问他的名字及代表身份。侯西反于获悉他是自己的南安同乡时既感到一点意外与困惑。最后陈嘉庚恳邀这位年轻人到怡和轩共用晚餐、聚谈，一段漫长的交往于兹开始了。他与潘国渠的友谊始于一九三零年代，潘国渠当时在阿米年街道南学校任教。他知道潘国渠语文平高，不由钦敬，常亲临要求他过目自己拟就的各项演讲稿、电文或文件，并恳请修改与润色。后来他即常托人携便条邀他前往怡和轩用餐或协助一些与筹款有关的文书工作。迄星洲沦敌前夕，潘国渠收集的此类便条共有七百多件，这些便条皆与“务请帮忙”或与华社事务有关者。陈嘉庚的一名族亲陈赐曲是新加坡已故的一名百万富翁（生于一九零一年），他曾告诉笔者当年担任谦益麻坡分行经理时陈嘉庚常常写信给他的情形。在信中，陈嘉庚对于该分行管理乏善事耿耿于怀，指出麻坡分行乃南马树胶聚散中心，对于公司之整体经济表现关系重大。故陈嘉庚恳请他竭尽所能，将该分行行政管理好。陈嘉庚的客气、关怀、语重心长及亲身垂顾，感动了这位年轻的经理。陈赐曲在一九三零年代自行发展。一九二六年末，孙崇瑜从槟城前来新加坡担任华民政务司署首席翻译时，即开始了与陈嘉庚的友谊。后来他擢升为华民政务司帮办，成为兀敏（生于一八八六年）及左顿（一八九零至一九八一）的得力助手。在槟城时，一名怡和轩会员嘱咐他抵星时可寄宿于该俱乐部。他踏入怡和轩之当天即与陈嘉庚见面。他们坦诚交谈，互相欣赏与尊敬对方。孙崇瑜年青、能干、聪颖，对华社所持观点进步，具说服力。还有，他是新加坡能操全部华族方言的少数华人之一。

      至于英语，更是无懈可击。他发现陈嘉庚谦恭、坦率、见闻广博、善于思索，在社会与教育事务上，与叻闽两地华人社会关系密切。他们彼此间的友谊从不同方面日益茁长，并持续一生。尽管这种友谊是相互促进的，陈嘉庚却发现孙崇瑜所给予的他的帮忙，乃是多方面的。比如孙崇瑜将英文书报中有关中国或华人事务的讯息提供给他，借以集思广益。

      陈嘉庚酷爱阅读，举凡有关历史、政治及国际事务者一概不放过，这是“不耻下问”外获致学问的另一种途径。据说一九二三年接掌怡和轩后，他的第一项工作即是在俱乐部内设立一间图书室。孙崇瑜帮他编排书目。人们发现他常滞留室内阅读或作笔录。他很少松懈下来，自修加强了他的思考力，也锻炼他辨析文章的能力。据潘国渠反映，陈嘉庚对中国古代历史及现代史，了然于胸，在演讲与谈话中，常旁征博引。他的儿子陈国庆，亦欣赏他的这种引经据典，说理滔滔，视他为一名学者。

      至于他又是一位怎样的父亲，怎么样的家庭成员呢？陈国庆为笔者提供了一个透视其举止思想的难得机会。他父亲给他的形象是一直在变化着的。他年轻时，父亲很严厉，常于早上六时正敲门唤醒他。十五岁那一年，他适在道南学校读书，母亲给他买了领结，父亲见他打上即唤他过去，问道：“在你颈上的是什么？”“是领结”，他答道。他父亲对答话很感不悦，说“我知道是领结，你从何弄来的？”“是妈妈买给我的。”父亲即往见母亲，追问购买领结的详情。不久即唤他过去，批评道：“你尚未知道如何赚钱即系领结，待你赚钱后，你将系什么呢？”直至一九三零年代他长大成人并开始了自己的事业时他父亲才允许他系领结。一九三一年末，陈国庆在新加坡勿拉士峇沙路圣约瑟书院修完中学后，计划到美国修读军事课程，遭到父亲坚决反对，父亲对他有另一套完全不同的打算。父亲认为军人生活艰苦、危险，又不像是一项职业。事实上，将他训练为整间涂桥头熟品厂的经理，早已是父亲心中的“本本”了。就这样，他即以塗桥头熟品厂受训经理的身份开始赚取所需，月薪为区区十五元，相等于厂里一名普通工人的月薪。

      第一次上班前夕，他父亲还为他准备了更多令他难堪的消息。父亲声色俱厉的不许司机载他上班，他不得不步行半里路，从加东花园美雅路到丹戎加东，然后乘搭巴士前往工厂，就这样往还了六个月的时间。在巴士上，他常受到厂内工友的奚落，有时还“头家仔，头家仔”的叫唤，好不刺耳。六个月后，他父亲才嘱司机载送，总算将他救离困境。父亲之目的无非是要他“吃苦”，东南亚一带华人即有这样的传统，俾他们的子嗣在事业发展前经受一番酷厉的磨练。

      陈嘉庚在涉及子女们的事务方面，或许曾有“粗鲁”，甚至是“令人不能容忍”的表现。他在一九三四年插手陈国庆的婚事即为明显例子。有一回，自香港返新加坡途中，陈国庆在一意大利客轮上邂逅一名少女，对她一往情深，回来后即约会频频，不旋踵即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他父亲却以该名少女热衷跳舞、擅于社交为由一口拒绝所请。陈嘉庚一旦反对，那事情就难办，尽管儿子说她已答应永不跳舞。36当一九八一年忆述及此段令人不快的插曲时，豁达且富于哲思的陈国庆坦言是他父亲改变了他的一生——先是职业，后是婚事。

      在一九三零年代，由于与父亲在怡和轩见面的机会多；陈国庆发现父亲是一个心地烫热、充满启迪性的人，虽然一路来父亲本身即以吃苦耐劳著称，却常常关怀他的健康，不时叮嘱他若无进食则别干超时加班的工作。在一九三七年中日开战，抗战筹款活动如火如荼开展着的年头，是他父亲鼓励他带头发动新加坡侨生社会以响应募捐号召，这一个成就，迄今仍令他以及其他委员们感到无上光荣，引以为傲。

      在战后年代，陈国庆不论在政治或思想方面，与父亲更加亲近。父亲对他的信任，使他更坚定不移的追随父亲的路线。有一点令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父亲审时度势的能力。他为着中国的统一而在一九四零年代倾向毛泽东即为显例。

      一九五零年当他父亲决定永别新加坡到中国定居的时候，陈国庆即与大哥陈济民被委任为陈嘉庚星马二地的事业的共同督理人，这一做法丝毫不会令人感到意外。

      陈嘉庚共结婚四次。他的第一位夫人名为张宝果（一八七六至一九一六），乃集美村一秀才之女，虔心向佛，年华十八，后共为他誕下四子（济民、厥祥、博爱与博济），三女（爱礼、丽好、爱英）。陈博济、陈爱英后来过继陈敬贤。陈丽好则过继其第三任太太叶却娘（一八八七至一九七零）。

      他的第二任太太吴惜娘（一八七五至一九七四），厦门人，为他生育三子（元凯、元济与元翼），三女（亚惠、亚妹与保治）。

      叶却娘亦为厦门人，嫁给陈嘉庚后，生有一子（国庆），三女（来旺，十三岁时去世，陈玛丽、丽珠）。他的第四头婚事是娶了新加坡出生的周氏女，产下一男孩名国怀。38周氏在星洲沦陷前病故。

      综上所述，陈嘉庚总共育有十七名子女。

      虽然一般而论他的四名妻室受教育不多，对于商务与政治一无所知，他们却为家庭带来和谐、稳定、安宁与保障，舍此陈嘉庚乃难于专心致志于自己的业务及自己对星马社会与政治事务的领导。他们将孩子们辛苦带大，为他门中的一些料理婚娶，可谓母恩浩大。犹有进者，她们也将经禧圈、加东美雅路两处住宅带来满庭芳香。看来，“每一位成功的伟人身后皆站着一个女人”这一句西方名言在此亦找寻到立足点了。

      现在我们不妨将陈嘉庚子女们的情况作一简单介绍，借以充实并总结陈氏第二十代族谱的描述。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进一步让人了解陈嘉庚通过男婚女嫁与东南亚其他华人家族结谊的情况。

      陈济民，长子，曾在北京国立大学修读地质学，略通英语，在其父利峇峇里路总部工作，一九三四年转职妹夫李光前之南益公司，后当公司董事。他结过两次婚，第一位夫人杜宝鸾在一九四二年六月九日死于中国广西省柳塞，当时一家人正由昆明辗赴福建途中。王素月乃续弦者，诞有一子名陈立人（TAN DIB JIN).

      陈厥祥（一九零零至六四），在集美完成小学与部分中学教育，略谙英语。亦为总部职员之一，一九四五年后移居香港，担任香港集友银行经理。一九二二年在厦门娶王素虹，育有一男一女。

      陈博爱（一九零七至四四），曾肆业厦门大学，中文较英语强。他寡言、内向，好学不倦，由于体质弱，加上好学，极得父亲关爱，在涂桥头熟品厂任职，一九二九年娶马六甲闽人曾江水女曾玉琴为妻，一九四一年染上肺病，一九四四年三月七日于苏门答腊一处山区（KABANJAHE)疗病时逝世，育有一女。

      陈博济，第四公子，后过继陈敬贤为长子。

      陈国庆，第五公子，一九一二年五月十九日生于新加坡。先后在华文与英校受教育，中英兼通。自一九三一年底即任职于父亲之熟品厂，直到一九三四年二月该厂结束营业时为止。不久，即与父亲合伙从事生意，担任德光砖厂与柔佛州士乃胶园经理。德光砖厂乃当年新加坡第二大砖厂，每月生产百万砖块。一九三五年三月，陈国庆与一名船货供应商之女蔡明娘结婚。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他再娶一位潮籍布商之女罗慧贤为妻。故他共育有八名子女（三男五女），子女皆接受高深教育。

      陈元凯，居第六，中英兼通，毕业于新加坡华侨中学及英华中学，是创立于一九二九年的莱佛士学院的理学士。娶一星洲华商周连生之女周明真为妻，育一子二女。

      陈元济，七子，亦中英兼通，明古连街中南学校毕业，在华侨中学读了两年，后转英华补习学校完成高级剑桥文凭课程。妻子名许阿于，育有一子二女。

      陈国怀，八子，叶却娘养子，于新加坡东海岸路圣巴德立学院完成高级剑桥课程后，继往香港启德机场内启德航空学校进修两年，本欲再往美国深造航空工程系，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事爆发后乃打消是图。已婚，育一子一女。

      陈元翼，排行第九，也是陈嘉庚幼子，小学就读于欧南路之工商学校，后在华侨中学念完初中，高中则在英文源流之英华中学完成。后继往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深造，修读商业管理，获工商管理学士衔。他的太太名叶月英，乃叶玉堆之女。育有一女。

      在陈嘉庚众儿女中，爱礼年纪最长，她于一九二零年嫁给李光前。这位东床快婿，乃陈嘉庚亲自拣选的。李光前在其岳父处工作多年，一九二七年另谋发展，不久即成为一位树胶业巨子、银行家，是战后新加坡最富有的成功商人之一。育有三子三女。

      陈丽好，次女，一九二三年嫁林忠国为妻，林忠国乃潮帮最负盛名巨富林义顺之子。他们育有一子一女。

      陈亚辉，三女，嫁傅定国。傅定国乃陈嘉庚数间公司的上海分行职员，后为陈召回擢升为总部职员。他亦是陈嘉庚亲手挑选的一名女婿。育有三子三女。

      陈亚妹，四女，夫婿温开封，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曾任职兀也轮胎厂，为陈嘉庚慧眼所识，聘任为涂桥头熟品厂总经理，两口子育下二子三女。温开封在二次大战中避居槟城时去世。

      陈玛丽，五女，幼年时转送给一天主教家庭养育，嫁谢永辉，育一子。

      陈丽珠，六女，一九二八年嫁曾江水子曾成保，育三子三女。

      陈保治，七女，嫁曾任道南学校校长之李天游。李天游后辞职任《南洋商报》督印。战后在商场上极为顺利。一九七八年逝世后，留下三子一女。

      陈爱英被父母过继给叔父陈敬贤，嫁周百良，周父乃闽人周献瑞。此门婚事是陈国庆与周百良长兄周炳炎一九三五年撮合的。

      或者是慑于父威吧，陈嘉庚子女们多过着平静的居家生活。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一生一世皆丝毫无助于父亲之事业。陈嘉庚的几位儿子及女婿，皆在不同时期中为他所用，对陈嘉庚集团公司之行政管理、财务管理，建树良多。他们深受重用，担纲负起制定专门或一般性政策方针，对于公司之繁荣发展，居功厥伟。由此我们可以持平的说，陈嘉庚于一九二零年代之经济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儿婿们之忠诚与群体努力分不开的。

      还值得一提的是，子女们所缔结的婚姻关系也派上用场。亲近的家庭关系促进了亲家间的团结，抬高了社会地位，也增强了企业财力。

      有关雇从关系及婚姻关系之微妙作用，我们且留待第四章，即陈嘉庚社会地位之建立部分中进一步阐述吧。在此先说一句，通过婚姻将势力雄厚之家庭连成一气，其本身即是一项不容忽视的成就。这些煊赫家族包括李光前，林义顺，曾江水，周献瑞及叶玉堆等，这是直接方面的，至于间接方面，则又伸展至其他不少星马豪门巨贾的关系内。